"我们互构为同伴物种": 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 动物死亡与性别伦理

"We Are Mutually Constructed as Companion Species": Animal Death and Gender Ethics in Alice Munro's Stories

涂 慧(Tu Hui)

内容摘要: 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动物死亡不仅揭示动物自身在加拿大殖民进程中的不幸命运,而且烛照动物命运与女性遭遇、性别伦理的内在关联。马和狐狸等动物作为家庭经济来源被无情屠宰,揭示出动物被人类宰杀与女性被男性操控具有本质的一致性;狼和浣熊等动物作为现代知识标本被展示,暗示着人类施加动物的痛苦与男性施予女性的创伤具有深刻的关联性;山羊等动物作为女性心灵同伴被屠戮,折射出动物被人类屠杀与女性生命力被父权阉割具有内在的同构性。门罗小说中的动物死亡以动物他者化和共情化、性别伦理化和政治化的书写特点,构成一个携带伦理内涵、历史语境和思想价值的文化症候。由此,改变不平等的性别伦理,需消除人类与动物等权力机制中的不平等。

关键词: 艾丽丝·门罗; 动物死亡; 性别伦理; 女性规训; 空间权力作者简介: 涂慧, 文学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成员, 主要从事中外文学关系和英语文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的动物书写演变研究"【项目编号: 21FWWB022】、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创新团队项目基金【项目编号: 3011401002】、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原创性成果培育项目"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的动物书写演变研究"【项目编号: 2021WKFZZX021】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项目"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的动物书写与殖民话语演变研究"【项目编号: 2021WKYXQN050】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We Are Mutually Constructed as Companion Species": Animal Death and Gender Ethics in Alice Munro's Stories

Abstract: Animal death in Alice Munro's stories not only reveals the fate of animals themselves in the process of Canadian colonization, but also reveals the intrinsic

relevance between animal fate, female encounters and ethical discipline. Animals such as horses and foxes are ruthlessly slaughtered by human as a source of family income, which reveals the essential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killing of animals and the discipline of women. Animals such as wolves and raccoons are displayed by human as specimens of imperial knowledge, which implies that the pain and silence of animal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auma and silence of women. Animals such as goats are slaughtered by man as female spiritual companions, which reflects the inherent isomorphism between the murder of animals and the castration of female vitality. Animal death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imal otherness and empathy, gender ethics and politicization, which constitutes a cultural symptom with ethical connotation, historical context, and ideological value. In order to change the unequal gender ethics, we should eliminate the inequality in various power structures.

Keywords: Alice Munro; animal death; gender ethics; female discipline; space power

Author: Tu Hu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chool of Humaniti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nd a member of Center for Chinese Contemporary Writing Research,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e is mainly engaged in liter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animal criticism (Email: tuhuitracytty@63.com).

当代加拿大作家艾丽丝 • 门罗 (Alice Munro, 1931—) 擅长以极简风 格、精确描写和平淡笔墨,细腻描绘加拿大广袤的农田森林、河流湖泊、四 季变换、动物景观,在不动声色的字里行间,叙述小镇人们日常平淡生活中 的隐秘奥妙和深不可测。处在加拿大独特的后殖民历史语境和后人文主义场 域之中,门罗笔下的动物死亡(尤其是非正常人为动物死亡),不仅携带复 杂的国家历史叙事基因,具有隐含的物种空间权力表征,而且折射内在的性 别伦理修辞因素,蕴含着与众不同的性别、历史和政治内蕴。与此同时,伴 随现代性反思思潮和女权主义运动实践,门罗小说中的性别伦理书写以平淡 琐碎的日常生活为中心,以性别平等、互助与和谐为伦理诉求,审视基于传 统父权制的性别伦理与社会差异,批驳男性对女性的规训、父权对女性的戕 害, 反思女性对男性的臣属、女性对自我的压抑。

动物死亡频繁出现在门罗不同主题的小说中,诸如《男孩和女孩》中 的狐狸和马, 《破坏分子》中的狼、浣熊、黑熊和鸟, 《逃离》中的山羊, 《我年轻时的朋友》中的奶牛和羊,《弗莱兹路》中的野水貂和火狐等。其 中,最为典型也最具特色的文本当属《男孩和女孩》《破坏分子》和《逃

离》。正如美国学者哈拉维在《当物种相遇》中所言,动物与人类之间有着 无法分割的深层关联,"我们互构为同伴物种,我们在肉体上互相构成" (Haraway 16)¹。经由动物被屠宰、被猎杀和被谋害的共情书写,三个不 同文本从不同角度揭示以男性为主体的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身份规约、身体侵 犯和心灵规训,映射女性被男性和男权社会操控、欺凌和阉割的深层伦理意 涵,在某种程度上构成耐人寻味的三角对话关系。

一、动物作为家庭经济来源:动物被宰杀与女性被操控

16世纪之前,北美广袤土地的主人是土著印第安人、极北地区的因纽特 人以及大量的动物。自 1534 年, 法国人卡蒂埃(Jacques Cartier) 抵达加拿大 探寻北美洲北部海岸航线后,英法等西方殖民者纷纷入主北美新大陆,通过 屠戮印第安人夺取殖民空间,捕杀野生动物来获取物质经济利益。二战后, 广袤北美荒野中的印第安人和动物大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众多农场、小镇 和白人。此时的加拿大已完成由红种人向白种人转换的种族过程,实现了空 间权力和民族权力的种族位移。几个世纪以来,毛皮贸易一直是英帝国哈德 孙湾公司经济的重要来源,但持续的毛皮贸易已使海狸、狐狸等毛皮动物难 觅踪迹,圈养毛皮动物于是成为有利可图的营生。这正是《男孩和女孩》《快 乐影子之舞》《弗莱兹路》等作品的社会历史语境。帝国权力改变了动物尤 其是野生动物的活动空间、生活习性、生产方式与价值功用。狐狸由野生动 物变成家养动物,其价值全在毛皮,骨肉则是垃圾;马由传统的交通运输工 具变成马肉,成为狐狸的饲料,马和狐狸成为白人农场主间接或直接的经济 来源。

短篇小说《男孩和女孩》(1968)通过家养动物两匹老马(马克和弗洛 拉)被宰杀的故事,揭示二战后加拿大农场日常生活中隐秘的空间权力与性 别伦理。小说以11岁女孩"我"的叙事视角叙述;"我"爸爸饲养狐狸,每 年秋冬时分把狐狸宰杀剥皮卖给哈德逊湾公司。"我"爸爸建造了我们的农 场,设计的一切都精巧实用而井井有条。"我"家的农场被分隔成秩序井然 的三个典型空间:妈妈整日忙碌劳作的厨房,爸爸经常活动和工作的谷仓、 地下室与屠杀房,以及圈养家养动物的畜栏。"空间并不是人类生活发生干 其中的某种固定的背景,因为它并非先于那占居空间的个体及其运动而存 在,却实际上为它们所建构"(卡瓦拉罗187)。加拿大广袤地理空间的嬗变 深深铭刻着白人殖民者的价值秩序和意识形态。崇拜鲁滨逊的爸爸像鲁滨逊 一样,在自己的王国建构一种秩序井然、权力等级分明的日常生活空间,体 现其男性主体意识和性别伦理。正处青春期的"我"亦体味到性别在空间上 的权力结构关系。妈妈活动的空间主要在厨房,终日忙碌些不重要的日常琐 事。而"我"无时无刻不在逃避厨房,讨厌被妈妈留在厨房干活,感觉屋内

¹ 本文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的活没完没了,令人疲惫不堪。

爸爸日常活动的空间主要是地下室、谷仓内外、畜栏和屠宰房。相对 于妈妈活动的居家内部空间,这些空间都是居室外部空间,是代表更高的价 值秩序的"屋外"。"我"喜欢跟着爸爸干活,喜欢看爸爸在地下室剥狐狸 皮: 能帮他干活, "我"会感到自豪和激动, "屋外的事儿,帮爸爸打下 手,则具有仪式般的重要性"(门罗,《男孩与女孩》 153)。空间结构隐 含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男性通过分配女性活动空间,在女性日常生活空间 中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实现对女性行为规范的内在规训,生产出从肉体 到精神都驯服的女性。性别伦理和权力关系在空间的规划、分配和生产中运 作生成。妈妈终日在厨房忙碌,不再涉足谷仓、畜栏等男性空间,她已被规 训和型塑,其臣属的女性身份已经完成。她勤勉温顺,遵守空间所表征的性 别权力,看到"我"自由出入室内屋外、无视女性规则的越举,她既无奈又 嫉妒。

较之妈妈对女性臣属身份的认同与维护,"我"更向往成为价值秩序等 级中的男性强者。"我"喜欢唱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歌曲《男孩丹尼》,晚上 "我"给自己讲故事,将自己想象成英雄和强者——在爆炸的楼里救人,杀 死恶狼保护老师,骑在马上接受众人感谢。尽管饲料推销员和妈妈都不认为 "我"是爸爸真正的帮手,奶奶也对"我"进行性别规训,但"我"都不以为 然地予以抵制。然而,马克和弗洛拉之死,使"我"完成了"第二性"女性身 份的建构。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看来,"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 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而"伦理身份是道德行为及道德规范的前提,并对道 德行为主体产生约束"(聂珍钊 263-264)。见证这两匹马被杀的全过程,使 "我"对社会性别权力结构由反思走向反抗终至臣服。"我"和弟弟在谷仓里 全程偷看, 马克如何被爸爸和亨利叔叔枪杀。马克被杀时的无力和痛苦刺激了 "我",使"我""对爸爸和他的工作有了一种全新的谨慎态度,要保持距离 的感觉"(门罗,《男孩与女孩》160)。"我"初步确立并接受女性的臣属 身份,意识到横亘在爸爸、自己和马克之间的距离,爸爸对动物拥有生杀予夺 的权力,而"我"也不是爸爸这样的男性强者,"我"和动物一样在权力等级 秩序中是弱者。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划界,正是个体身份建构的前提。"我"审 视性别结构中自身的位置,开始建构自己的现实身份与性别属性,"我"正 在生成"第二性"。"我"开始用印花布料给自己做梳妆台,在"我"和弟 弟的床之间放个隔断。弟弟睡着后,"我"还是和自己讲故事,不过在想象 中的"我"成为需要被保护的弱者。当我"想知道自己长大以后会不会漂亮 的时候"(门罗,《男孩与女孩》160),马克被杀的场景便会无意识地闪进 "我"的脑海,"我"显然意识到作为弱者的女性与被主宰的动物之间存在内 在的关联。所以,当爸爸和亨利屠宰弗洛拉时,"我"本可以把逃跑的弗洛拉 关在农场里,但我却本能地把门打开,让弗洛拉逃跑了。

显而易见,在父亲屠戮动物的过程中,女孩体会到动物与自身所遭受的 父权压迫与共同命运, 感受到女性命运与动物命运具有同构性。因同情而放 走弗洛拉,既是基于她对女性与动物命运同构的共振,也是她对父权制不自 觉的抵抗。但是这一英雄义举却顷刻之间遭遇瓦解。面对弟弟的告状和指责, 父亲原谅了"我":"她只是个女孩子"(门罗,《男孩与女孩》164)。我 从心底认可了爸爸话语权力隐藏的性别价值秩序和父权制: 女孩作为弱者是 非理性的、情感的、缺乏勇气和力量、自然免不了犯错。美国女性主义学者 弗伦奇(Marilyn French)认为,"父权制是一种建立在男性不同于动物(即 女性),优于动物(即女性)的意识形态之上,这一优势的基础在于男性具 有更高的能力/知识,即所谓的神性、理性和控制力"(134)。女孩认同了 父亲的判断,也便完成了自我作为一名女性在性别中的定位,一名父权制权 力结构中的臣属女性由此生成。男性通过征服和屠杀动物内在地完成对女性 的征服和宰制,动物被征服、被虐待、被杀死的过程,也是女孩被规训、被 形塑、被征服的"第二性"的过程。由此,女性由外而内地逐渐生成被规训 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理念。

正是经由杀死动物,男性逐渐生成具有现代主体性的自我,弟弟通过参 与杀死弗洛拉成长为具有性别权力意识的男性: 女性则日益成为受男性支配 和规训的他者, "我"通过观看屠宰弗洛拉而逐渐认同了社会强加于自身的 性别规训。在这一过程中,杀死动物既展现了男性在社会结构中优于女性的 权力位置,确证了男性对女性和动物的优越感和支配感,也形象说明加拿大 已然征服广袤无垠的荒野。"我"虽然放走了弗洛拉,但知道它是跑不掉的。 "这个地方没有让她逃跑的开阔田野,这里只有农田"(门罗,《男孩与女孩》 162)。这片广袤的土地不再是无人开垦的北美荒野,而是成片成片已被殖民 的农田,动物不再是荒野上的主人。"我知道我们活着就需要它们死"(门罗, 《男孩与女孩》160),杀死经济动物,获得经济利益,既是加拿大白人殖民 者的经济特权,也是彰显男性掌控家庭、高于女性的内在需求。这背后有着 国家权力机制的隐蔽支持——白人殖民主体拥有对动物的经济权和处置权。

在门罗小说的动物书写中,男性通过暴力杀死家养动物,彰显社会经济 政治结构中的男性霸权,其背后有着强大的国家权力支撑。杀死动物展现了 男性/动物的物种权力秩序,女性观看动物死亡的全过程,既是男性权力与 等级秩序的内化过程,也是女性被驯化的隐秘过程。由此,性别伦理在日常 行为中生产出来, 杀死动物成为一种隐含的性别伦理和政治实践。

二、动物作为现代知识标本:动物被展示与女性被凌辱

除关注暴力杀死家养动物外,门罗还关注儿童性侵问题,敏锐注意到男 性对动物的暴力和屠戮,与对女性和儿童的暴力具有同构性。男性通过展示 动植物知识和对动物的主宰呈现男性霸权,实现对女性、儿童的控制和侵犯,

这种男性霸权的背后亦有强大的国家权力支持。

《破坏分子》(1994)聚焦于川童性侵事件,将虐待川童(主要是少 女)与动物暴力并置讲述,互为镜像地揭示少女遭际与动物命运的同构,其 中被解剖的沉默标本动物与难以讲述创伤经历的莉莎,同为父权制的受害 者。二战后,英国人拉德纳在加拿大斯特拉顿镇北部买下四百英亩荒地,依 据在英国博物馆的工作经验,改造出一个"自然博物馆"。在这片隐秘的私 人王国里,有诗意的小桥流水,有丰富的动植物,有各类本土野生动物标 本,如金雕、猫头鹰、雪號等各种猛禽,如狼、黑熊等丛林猛兽。在这片私 人领地上,到处竖着"禁止入侵""禁止入内""禁止打猎"的标牌。正如 福柯所言, "空间是任何权力实践的基础" (Foucault 252), 迪斯默尔正是 拉德纳得以对野生动物和莉莎进行控制和侵犯的空间基础。拉德纳将迪斯默 尔视为自己的领地和帝国,改变了土地的使用范型与空间形态,也改变了人 们的空间感觉。当莉莎从自己家跑向迪斯默尔时,感觉进入了"另外一个全 然不同的国度",这是"拉德纳的领地"(原文为territory)(门罗,《公 开的秘密》303)。人们误以为这里是一片自然保护区,拉德纳从事的是高 尚的公益事业。事实上,迪斯默尔并非为了亲近自然、爱好自然而建,而是 为了满足拉德纳的暴虐天性与个人欲望而建。相比莉莎家的毫无遮挡和简单 素朴,迪斯默尔隐蔽幽深,空气浓重,"味道刺鼻,或者也可以说诱人。某 些人行道强使人们礼貌地避开那些隐蔽地,某些石头也让人们无法跳过去, 一切都在呼唤着疯狂的举动"(门罗,《公开的秘密》304)。门罗对迪斯 默尔风景和空间的描写具有暗示性,暗示这里是欲望与罪恶的发生地。迪斯 默尔的原文"Dismal"本意为阴暗、忧郁,这里也的确是一个阴暗忧郁的地 方, "dis"在希腊语中是地狱的名称,在基督教中这个地方都由恶魔居住 (Ventura 313)。在这片私人领地,拉德纳让孩子们观看自己怎么剥下动物 的皮,动物如何被宰制被操控。驯服动物的过程亦是驯服儿童/女性的过程。 拉德纳通过操控动物彰显作为男性主体的自我对他者的主导地位和权力,为 操控女孩莉莎奠定权力基础和心理基础。

除了展示男性的空间权力和物种权力,拉德纳还通过自然科学知识操 控莉莎。孩子们最初受吸引,正是由于拉德纳向他们展示自然知识和标本知 识,孩子们学到很多东西,知道了狐狸住在兽穴里,莉莎"认识了鸟类、树 木、蘑菇、化石,还有太阳系。她知道某些岩石是从哪里来的,知道秋麒麟 草茎上膨起的地方里面长了白色的小蠕虫,这种虫子只能活在这里"(门 罗,《公开的秘密》299)。拉德纳通过建构迪斯默尔这个自然博物馆,展示 丰富的动植物知识来显示自我对自然的征服,通过剥制动物展示自我对动物 的征服,从而彰显父权制权威而控制莉莎——在莉莎的内心,她的确视拉德 纳为父亲、视贝亚为母亲,"就像一家人"(门罗,《公开的秘密》299)。 拉德纳强调动物剥制的科学性、技术性和艺术性,以此来遮蔽其暴力行为,

使之合法化。拉德纳对所剥制的动物标本进行科学分类, "标牌上注明了它 们的栖息地、拉丁语名称、食物偏好和行为方式。有些树上也挂着标牌,牢 固、准确、内容详尽"(门罗,《公开的秘密》283)。不仅如此,他将动物 剥制上升为一门技术和艺术,用轻木制作鸟类和动物的标本,体型较大的动 物用铁丝、粗麻布、胶水、碎纸和黏土进行完美组合。正是在科学、技术和 艺术的掩盖下,拉德纳的自然博物馆受到人们的赞叹,被视为"一片令人赞 叹的自然保护区"(门罗,《公开的秘密》278)。正如生态女性主义者科拉 德(Andree Collard)所言,"当暴力在'高贵的目的'的掩盖下呈现时,所 有的虐待都不再被看到,甚至经常被赞扬"(33)。

从回归伦理语境出发,"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分析 和批评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本身进行客观的伦理阐释,而不是进行抽象或 者主观的道德评价"(聂珍钊 256)。就现代知识生产体系而论,动物标本 剥制术是英帝国殖民和帝国权力的产物与结果,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正处于 全世界广泛殖民的鼎盛时期,认为大自然中的每样事物都值得收集1,通过展 示世界各地的动物及动物标本证实帝国权威和男性气质。在20世纪初的加拿 大,"动物剥制术的普及是显而易见的,证明这个国家拥有相对丰富的野生 动物数量"(Giesbrecht 189)。帝国权力是迪斯默尔空间权力的保障,空间 权力有助于生成父权制霸权,实现对动物和女性的征服和控制。同时,拉德 纳又经由帝国式的自然博物馆生产出各类自然知识,巩固其权力和空间。《破 坏分子》以含蓄隐晦的手法揭示男性霸权对标本动物与女性的暴力凌辱,其 背后有着隐秘的帝国权力支持。

小说多处将动物与女性并置,暗示动物与儿童同为被宰制的弱者,揭示 动物屠戮与性别暴力同构。六七岁的莉莎和肯尼曾被父亲警告说, "你们最 好别惹恼他,不然他会活剥你们的皮,就像他做那些标本一样"(门罗,《公 开的秘密》298)。来到迪斯默尔后,贝亚问了莉莎和肯尼很多问题,诸如要 是能变成动物,他们想变成什么。经常观看拉德纳剥制动物的孩子们,多会 想起各种动物的命运,并在自己和动物之间建立某种模糊的内在关联。这也 使读者"在儿童与被害者动物——拉德纳控制的被剥皮的动物之间建立一种 关联"(Dawson 78)。拉德纳只称他们为"孩子"(kids), "在英语中, 单词 kid 也可指由小动物皮制成的皮革。因此,这个词在动物标本制作师的 世界中成为一个邪恶的含义"(Bigot 115)。这也暗示拉德纳潜意识将儿童 视为可以制作成皮革的小动物,他们无力反抗、可以霸凌。英国文化历史学 家托马斯(Keith Thomas)认为,一旦将物种主义思想投射到其他边缘群体身 上,"女性、黑人、儿童、穷人、疯子和流浪汉都被视为没有灵魂的人形动物。 人一旦被视为动物, 便易被当成动物对待。动物不是人类统治伦理的关心对象, 虐待动物式的人便被合法化"(44)。将儿童视为没有理性与力量的人形动物,

¹ See Kalof, Linda, Looking at Animals in Human Histo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007) 145.

是儿童虐待行为的思想基础。用动物暴力暗示儿童性侵,将弱小动物与儿童/ 女性并置讲述, 门罗巧妙而有力地揭露了动物暴力和儿童暴力背后的物种主 义和父权制具有内在的同源性。

被凌辱的女性和被剥制的动物同样是沉默失语的、无法言说的,其身体 被展示、被观看、被欣赏。莉莎在池塘里游泳,不小心游得太远,拉德纳就 在附近,他伸手抓向莉莎的两腿之间,却做出伪善震惊的表情。莉莎假装没 有在意,奋力游向岸边,从装有标本动物的玻璃容器前走过。受辱的莉莎没 有凝视这些标本动物,二者同属于被展示、被欺凌和被侮辱的沉默个体。"莉 莎无法清楚讲述拉德纳袭击的创伤,但她站在动物间的位置讲述了,莉莎被 比作鸟——其沉默和被侵犯的身体正在被展示"(Dawson 74)。在迪斯默尔, 拉德纳无疑对莉莎进行过思想规训,莉莎通过确认女性的臣属身份学会了很 多世俗伦理, "学会不讲很多她知道的东西" (Munro 188)。为了间接暗示 贝亚,莉莎特地带贝亚去看后门小路中央的山毛榉树。树上刻着几个名字的 首字母 "L. L. K.", 依次是拉德纳、莉莎和肯尼。肯尼用拳头敲打下面一行 刻的字母 "P. D. P.",喊着"拉下裤子!"("Pull down pants!")(门罗,《公 开的秘密》302),但拉德纳假装用力打肯尼的头,却说"继续前行!"("Proceed down path!")毫无疑问,拉德纳曾命令孩子们拉下裤子,但贝亚并没有猜到 发生在迪斯默尔的一切。准备离开迪斯默尔时,莉莎再次提醒丈夫沃伦注意 山毛榉树以及树上的字母, 想藉此为契机讲述过去遭受的暴力和创伤, 解释 自己在迪斯默尔捣毁拉德纳房子的原因。然而,沃伦仅仅将莉莎的行为视为 孩子气的捣蛋与顽皮。在迪斯默尔遭受霸凌的莉莎,与被剥制的动物一样沉 默无语,无人关心,无法讲述所遭受的创伤和痛苦。

门罗小说"包含大量的空白、神秘和未叙述", "对尘封秘密的沉思, 是门罗短篇小说最擅长的"(May 241)。《破坏分子》以隐晦方式讲述因 童年性侵导致的精神创伤,然而受害者的沉默寡言使创伤体验难以讲述和传 递,"叙述者对虐待事件叙述得很少,叙述的沉默正回应虐待过程中的沉 默"(Bigot 113)。门罗巧妙地通过动物在剥制过程中遭受的痛苦,有力地 揭示小女孩莉莎所遭受的身心创伤,标本动物和女性弱者命运同构,同为父 权制的受害者。在关注儿童性暴力的同时,门罗亦瞩目动物遭受的生命之 痛。父权制建构二元等级秩序的社会权力结构,承认男性拥有对女性和动物 等一切居于次级等级秩序的他者的权力,是动物暴力和女性压迫的根源。

三、动物作为女性心灵同伴: 动物被屠杀与女性被阉割

在 20-21 世纪之交的加拿大乡村, 受全球化浪潮和社会体制的强力裹挟, 无论是家养动物还是野生动物,均与人类建立性质不同的关系。形形色色的 动物以物种的丰富性和特点的多样性,悄然进入门罗小说的叙事之中。诸如《破 坏分子》中贝亚担心野兽进入自己的居室,《弗莱兹路》中班尼叔叔驯养大 量野生动物,《快乐影子之舞》中兔子会窜到马路上,《机缘》中朱丽叶在 火车上看到一条巨大的狼, 《我年轻时的朋友》中母亲的老家会有熊在农舍 附近散步、《逃离》中浣熊和松鼠可能会闯进居室。山羊、马、奶牛、更是 农舍常常豢养的农场动物。比如《我年轻时的朋友》中弗洛拉姐妹驯养山羊、 奶牛、《逃离》中卡拉和克拉克养着几匹马和山羊。相对而言、敏感的乡村 女性更易感受农场动物与其命运的同频共振——狭窄的生活空间、被束缚的 命运、遭受父权制的压迫,这使女性更易视其为同伴动物。《逃离》(2004) 中的山羊弗洛拉,便是卡拉心灵与精神上的同伴动物。

卡拉淳朴天然, 喜爱动物, 与动物相伴是她的毕生理想。正是出于对动物 的喜爱,卡拉渴望"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门罗,《逃离》33)。18岁那 年,卡拉离开父母,逃离了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与驯马师克拉克私 奔。婚后二人在乡间安居, 住在活动房屋里, 靠马术培训艰难谋生。婚后生活 并不愉快, 克拉克脾气暴躁, 大男子主义十足, 卡拉事事迁就取悦他, 备感压 抑窒息。唯有厩棚里的马儿和山羊,是她情感的寄托和安慰:"对她来说,最 能排除烦恼的还是上厩棚去为自己找点儿什么杂活来干干"(门罗,《逃离》 8);她"喜欢畜棚屋顶底下那宽阔的空间,以及这里的气味"(门罗,《逃 离》33)。

作为卡拉的心灵同伴和情感寄托, 弗洛拉帮助卡拉重新认识并审视自己 的生命状态。克拉克买回弗洛拉,是为了抚慰安定马匹。最初,弗洛拉完全 是克拉克的小宠物,在他跟前欢跳争宠,"像小猫一样敏捷、优雅、挑逗, 又像情窦初开的天真女孩"(门罗,《逃离》9)。此时的弗洛拉就像与克 拉克私奔时的卡拉一样,那时的卡拉"甘于当俘虏",理所当然、心悦诚服 地依恋克拉克,将他视为二人生活的设计师。可是长大后的弗洛拉更依恋卡 拉了, "它突然变得明智,也不那么轻佻了——相反,它似乎多了几分内在 的蕴藉,有了能看透一切的智慧"(门罗,《逃离》9)。长大后的弗洛拉 就像婚后的卡拉一样,对于克拉克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她们都变得更有智 慧。弗洛拉的改变也是卡拉的改变,是弗洛拉帮助卡拉更清楚地审视自己与 克拉克的关系,反省自己的生命状态,卡拉与弗洛拉由此成为心灵上相互依 恋的精神伴侣。最熟悉卡拉的两个人都将卡拉与山羊进行类比。西尔维亚潜 意识中将卡拉比作精灵般的山羊,她称赞希腊的山羊像当地的精灵,卡拉一 定会非常喜欢它们。克拉克则潜意识中已视弗洛拉为卡拉的化身。动物对于 卡拉来说, 是亲人, 是朋友, 是精神伴侣。当她感到压抑沮丧来到厩棚时, 马儿们不敢正眼瞧她,就像儿童害怕生气的母亲,躲得远远的。只有弗洛拉 走过来挨蹭她,看她的眼神"并不完全是同情,倒更像是闺中密友般嘲讽的 神情"(门罗,《逃离》8),仿佛嘲笑她私奔的错误选择。所以,卡拉对 待马匹就像母亲,态度温和严格,对待弗洛拉则似朋友,平等相处。对克拉 克而言,动物既是宠物也是玩物,高兴时柔情蜜意待之,生气时毫不留情杀

之。丽姬是他的小宠物,丽姬的主人得罪了他,他便再也不照顾丽姬了。弗 洛拉曾是他心爱的宠物,最后他还是残忍地杀死了它。对待动物的态度正是 克拉克对待卡拉的态度, "他对马匹有时会显露出来的柔情——对她(即卡 拉)也是这样"(门罗,《逃离》32)。克拉克对待动物居高临下的态度, 正是其物种主义思想的反映,是其父权制意识的一个面向。他像驯服动物一 样规训卡拉,终使卡拉难以忍受,激发卡拉的逃离。但在逃往多伦多的汽车 大巴上,被父权制驯服的卡拉就像被驯服的动物一样,难以再生发出反抗父 权制、追求女性主体性的力量,"她像匹被捶击过的马似的,怎么也站不起 来"(门罗,《逃离》35)。

在卡拉的意识觉醒过程中,是弗洛拉启迪卡拉逃离男权制阴影,追寻 独立的主体。弗洛拉逃走了,卡拉接连几天都梦见弗洛拉。在梦里,弗洛拉 引导她"来到一道铁丝网栅栏跟前,也就是某些战场上用的那一种,接下去 它——也就是弗洛拉——从那底下钻过去了"(门罗,《逃离》7)。卡拉 潜意识中认为,弗洛拉是在启示她逃离压抑束缚的生活,追求自我的独立自 由。"逃离就是向往一种没有克拉克的生活,这也在她的梦中被预见。梦中 期待的未来是梦者最喜欢的,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希望它发生 的'"(Bahador and Zohdi 172)。卡拉的两个自我——理性意志与自由意 志开始较量, 在西尔维亚家自由轻松的氛围中, 追求自由独立的自我被激 发,最终决定逃离。一般说来,自由意志"主要指一切感情和行动的非理性 驱动力", "不受理性约束,往往以激情和冲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聂珍钊 278): 而理性意志则"由特定环境下的宗教信仰、道德原则、伦理规范或 理性判断所驱动","以善恶为标准约束或指导自由意志,从而引导自由意 志弃恶从善"(聂珍钊 279)。在陌生逼仄的汽车大巴上,被男性霸权社会 驯服的温顺自我又占据上风,卡拉重新归来,逃离失败。令人意外的是,弗 洛拉竟然也重新归来,很久之后,直到有一日收到西尔维亚的信,卡拉才知 道弗洛拉曾经回来过。她猜测小树林里的骸骨是弗洛拉的,自此,卡拉心中 永远深藏着一个诱惑,不自觉地向那走去。实际上,卡拉早已将弗洛拉视作 另一个自我,一个追求精神自由与独立主体的自我。回归后的卡拉显然意识 到生命中追求主体独立、精神自由的自我被扼杀。她深深呼吸时, "像是肺 里什么地方扎进去了一根致命的针"(门罗,《逃离》46),但她已无力反 抗, 甚至欺骗自己, 弗洛拉说不定被克拉克放走了。随着时间的流逝, 卡拉 不再去那片小树林。

就性别伦理修辞而言,弗洛拉是克拉克追求自由生命的别样自我,一个 不妥协与不服从的生命幻象。克拉克杀死弗洛拉,既是对其逃离反抗、胆敢 挑战其男权制权威的惩罚, 亦是对卡拉的潜在规训与操控, 扼杀了卡拉追求 生命自由和精神独立的主体性, 使她成为男性霸权社会一个无力反抗的臣属 女性。弗洛拉被克拉克杀死之时,亦是卡拉被彻底驯化之时——反抗的结局

是死亡,卡拉只能乖乖做一个温顺听话的"驯养动物"和"男权臣属"。男 性通过驯化动物来规训女性认同以男性为主的文化权力话语,通过杀死动物 来惩罚女性服从社会权力结构秩序。这种社会权力结构秩序在被女性个体默 默内化的同时,也使女性产生了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心理机制,从而生成"驯 顺的肉体"(福柯 156)。

四、动物书写作为伦理共情:动物他者化与性别伦理化

在门罗小说中,动物死亡以所谓沉默的属下身份和他者形象,嵌入人类 与动物的亲密伦理关系之中,呈现出动物他者化和共情化、性别伦理化和政 治化的书写特点,构成一个携带历史内涵、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的文化症候。

首先,就死亡方式而言,门罗小说中的动物死亡主要是人类施暴于动 物,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在这一彰显物种权力的过程中,动物以沉默弱 小的失语形象被人类的现代化浪潮所无情裹挟,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文化 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换言之,现代性既深度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模式和思 维方式, 也重塑了人类与动物、男性与女性不平等的双向关系, 使动物他者 化与性别伦理化成为时代主流话语。其次,就纲目科属而言,门罗小说中的 动物死亡主要涉及马科动物、牛科动物和犬科动物、部分兼及鸣禽动物以及 其他。被宰杀的动物或为被驯化的性情温顺的牲畜家禽,或为未驯化的性情 狂暴的荒野动物, 在全球化浪潮和社会化体制之下有机融入人类的日常生 活。第三,就表现角度而言,门罗小说中的动物死亡书写或从性别塑造与职 业分工角度,或从帝国意识与殖民遗产角度,或从男性权力和文化规训角度, 呈现作家对以男权为主导的性别伦理的隐秘洞察。正是在与动物息息相关、 彼此共生的密切关系中,人类的动物共情意识、性别等级观念与共同体意识 得以建构与投射。第四,就功能价值而言,门罗小说中的死亡动物,或是家 庭经济的主要来源,或是帝国知识的现代标本,或是人类心灵的精神同伴。 三类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截然不同,而是边界模糊,彼此关联,甚至相互重 合。第五,就空间实践而言,无论是虐待和宰杀经济动物的日常行为,还是 制作和展示标本动物的科学行为,抑或杀死同伴动物的物种权力行为,大多 发生在私人性的日常空间和个人化的隐秘空间,诸如功能区隔的地下室和庭 院之中,味道刺鼻的私人博物馆之内,充满暴力的个人家庭之中。这种空间 实践的私人性和边缘性,有其值得深思和耐人寻味之处——男权机制和性别 伦理对女性的规训由外而内,悄然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国家权力和 知识体制对女性的压制潜移默化,时时规约置身其中的每个个体。最后,就 书写个性而言,对动物不幸遭际的共情书写,对动物悲剧命运的艺术再现, 对动物与人类关系的反思叙事,不仅以象征暗示形式出现在门罗和阿特伍德 (Margaret Atwood) 等当代作家的创作图景中,更以写实面貌呈现在西顿 (Ernest Thompson Seton)、罗伯茨 (Charles G.D. Roberts) 和莫厄特 (Farley Mowat)等动物作家的写实叙事中。比较而论,门罗小说中动物死亡书写的 独特性主要是,在加拿大殖民历史和帝国文化传统中考察动物死亡,展现动 物遭际与女性命运的内在关联性和日常隐蔽性。

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伦理选择把人类从兽中解放出来,〔……〕 伦理意识才开始出现,善恶的观念才真正产生"(聂珍钊 6)。在与动物的 亲密关系中,人类以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主客二分观念,将动物他者作为认 知坐标和镜像参照,根据不同的伦理语境建构出不同的伦理身份和道德意 识,由此动物书写投射着人类自身的伦理意识、精神内涵和文化想象。正是 通过动物被宰杀与女性被规训的内在关联,门罗小说反思以父权制为主体的 文明社会与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伦理的合法性,标举一种关注女性命运、反 思权力机制、倡导物种平等和性别平等的思想诉求。门罗小说穿行于日常幽 微之处和历史罅隙之中,通过展示日常生活中动物的不幸遭际,生动揭示出 性别伦理与动物死亡的内在同构性, 再现出女性如何逐步建构出自身在社会 等级秩序中的位置,被规训为从心灵到身体都驯服的"第二性"。因此,只 有消除其中隐蔽的权力机制,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女性平等;只有每个个体认 识到每个生命主体都是平等的,改变弱势生命遭受压迫的命运,才有可能 实现男女两性在社会历史结构中的真正平等。正如女性主义者本尼(Norma Benney) 在《众生一体》("All of One Flesh") 一文所言,女性努力推翻父权 制时,必须意识到其他生命体的痛苦,"只寻求自己的自由,而不同时寻求 同一地球上其他生命体的自由,这既不公平也不公正。这些生命从出生到死 都残酷地遭受父权制观念和体系的压制,它们也没有女性那样的权力可以组 织自己(反对父权制)"(142)。就本质而言,在加拿大冷峻复杂的后殖民 历史语境之中,门罗小说中的动物遭遇与女性命运具有隐蔽的内在关联和细 密的历史逻辑。二者共同被以父权制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所宰制,被以男性为 主导的权力机制所支配,被以殖民话语为表征的文化遗产所规训。其中,动 物是基于丛林法则的物种权力(即人类施暴动物)的牺牲品,女性则是基于 男权思想的性别伦理(即男性规训女性)的献祭品。

作为一种内涵丰饶、饶有趣味的动物叙事景观, 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 动物死亡蕴含独特的加拿大性别伦理、殖民历史和社会政治等多重内涵。动 物死亡不仅揭示动物自身在加拿大殖民进程中的不幸命运,暗示加拿大掌控 并征服广袤荒野及荒野动物,而且隐喻女性命运被裹挟进动物遭际之中,烛 照出父权制社会中女性遭际与动物遭遇的内在同构性。无论动物被展示与被 屠杀,还是女性遭歧视与被凌辱,均是基于历史传统、政治话语和性别权力 的伦理选择行为或伦理选择结果。在不同的伦理语境或伦理选择行为中,女 性的不同伦理身份得到建构或解构、迷失或确证、规训或颠覆。马和狐狸等 动物作为家庭经济来源被人类无情屠宰,使女性意识到社会权力结构中女性

与动物的臣属性,揭示出动物被人类宰杀与女性被男性规训具有内在的一致 性。狼和浣熊等动物作为现代知识标本被人类默然展示, 使缄默的女性感悟 到自身与沉默的动物共同遭受生命创伤之痛,暗示着动物的无言与女性的沉 默具有深刻的关联性。山羊等动物作为女性心灵同伴被人类冷漠屠戮,使女 性意识到动物并非臣属人类的物性他者,而是自身主体建构的内在部分:同 伴动物被无情谋杀意味着女性反抗男权制的精神力量被冷漠阉割,折射出动物 被人类屠杀与女性生命力被男权阉割具有内在的同构性。由此,门罗小说用 平淡而幽微的日常描写和含蓄而克制的叙事笔调,展示了人类以物种权力任 意宰制和随意戕害动物, 悄然撕开了父权制社会中权力机制与女性规训的温 情面纱,为"我们互构为同伴物种"之论,延展出一个充满象征空间和隐喻 体验的文本世界。

Works Cited

- Adams, Carol J. "Woman-Battering and Harm to Animals." Animals and Women: Feminist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Carol J. Adams and Josephine Donovan, ed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P, 1995. 55-84.
- Bahador, Raheleh and Esmaeil Zohdi. "Alice Munro's 'Runaway' in the Mirror of Sigmund Freu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 English Literature 4. 2 (2015): 169-176.
- Benny, Norma. "All of One Flesh: The Rights of Animals." Reclaim the Earth: Women Speak Out for Life on Earth. Léonie Caldecott and Stephanie Leland, eds. London: Women's Press, 1983. 141-
- Bigot, Corinne. "'Locking the Door': Self-deception, Silence and Survival in Alice Munro's 'Vandals'." Trauma Narratives and Herstory. Sonya Andermah and Silvia Pellicer, e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113-126.
- 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 [Cavallaro, Dani. Key Words of Cultural Theory. Trans. Zhang Weidong.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Collard, Andree. Rape of the Wild: Man's Violence Against Animals and the Earth. Indianapolis: Indiana UP, 1989.
- Dawson, Carrie. "Skinned: Taxidermy and Pedophilia in Alice Munro's 'Vandals'." Canadian Literature 184. Spring (2005): 69-83.
- Fiamengo, Janice. "The Animals in This Country: Animals in the Canadian Literary Imagination." Other Selves: Animals in the Canadian Literary Imagination. Ed. Janice Fiamengo. Ottawa: The U of Ottawa P, 2007. 1-25.
- 福柯: 《规训与惩罚》, 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 三联书店, 1999年。
-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Trans. Liu Beicheng and Yang Yuanying. Beijing: SDX Jointed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Interview with Paul Rabinow." Trans. Christian Hubert.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aul Rabinow. New York: Pantheon, 1984. 239-256.

French, Marilyn. Beyond Power: On Women, Men, and Morals.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5.

Fry, Northrop. The Bush Garden: Essays on the Canadian Imagination. Toronto: Anansi, 1971.

Giesbrecht, Jodi. Killing the Beast: Animal Death in Canadian Literature, Hunting, Photography, Taxidermy, and Slaughterhouses, 1865-1920.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2.

Haraway, Donna. When Species Meet. Minneapolis & London: The U of Minnesota P, 2008.

Kalof, Linda. Looking at Animals in Human Histo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2007.

May, Charles E. "Dialogues." Narrative 20. 2 (2012): 239-253.

艾丽丝•门罗:《男孩与女孩》,《快乐影子之舞》,张小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

[Munro, Alice. "Boys and Girls." Dance of Happy Shadows. Trans. Zhang Xiaoyi. Nanjing: Yilin Press, 2013.]

- 一:《公开的秘密》,邢楠、陈笑黎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
- [—. Open Secrets. Trans. Xing Nan and Chen Xiaoli et al. Nanjing: Yilin Press, 2013.]
- —:《逃离》,李文俊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
- [—. Runaway. Trans. Li Wenjun. Beijing: Beijing October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9.] Munro, Alice. "Vandals." The New Yorker 4 (1993): 179-190.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Thomas, Keith.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Sensibility. New York: Pantheon, 1983.

Ventura, H. "Aesthetic Traces of the Ephemeral: Alice Munro's Logograms in 'Vandals'." Tropes and Territories, Eds. M. Dvorak and W. H. New. Montreal: McGill Queen's UP, 2007. 309-322.